

困守与突围

——评毕飞宇小说“玉”篇三章与《青衣》

罗飞雁

(黄山学院 文学院,安徽 黄山 245041)

摘要:毕飞宇小说“玉”三章与《青衣》是集体主义文化的批评文本。前者表达了作者对集权下人性异化的忧虑,后者则张大了抗击集权文化的人性力量。谄媚或反抗现实成为这几部小说可资比较的基础,传达出毕飞宇知识分子的批判立场,以及在体制外建立个人乌托邦理想之于文化乃至人的存在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玉”篇三章;《青衣》;人性异化;个人乌托邦理想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47X(2008)01-0093-04

妇女解放是社会进步的天然尺度,也是女性走向自我完善的重要一步。它触及到社会批判与人性反思的内涵,使表现女性命运及其心灵秘史,成为文学最具魅力的主题之一。毕飞宇小说“玉”篇三章,通过玉家三姐妹的命运,透视了特殊历史时代与集权文化的非人性,吟唱出女性在梦想、欲望间浮沉的悲歌。

女性作为弱势群体,面对几千年封建文化所制造的复杂、稳固、难以撼动的权力体系,遭受的生存围剿较男性远远为胜,而当这种权力在文革中不受约束地扩张自己的势力时,女性的生存就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玉家姐妹不再是自觉放逐个性意识与欲望的旧式女人,为了确认自我价值,她们奋起反抗,在生存的隙缝间挣扎。但是她们未能从专制体制与集权文化所造成的精神困境中走出来,没有在体制外建立独立的精神世界。她们种种胆大妄为的举动,都不过是体制内的选择,规则内的挑衅。其抗争行为无异于画地为牢、作茧自缚,她们终将从个人奋斗者变为受招安的降卒,成为权力体系内可有可无的仆从。

要冲决根深蒂固的宗法观念和文革中恶性膨胀的政治权力的双重箝制,个人是无能为力的,但是能明确拒绝与反抗权力体系,认同自身理想的行为却是曙光来临、黎明在即的标志。《青衣》回答了“玉”篇三章中种种反抗无望的尴尬。筱燕秋以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风姿竭力甩开把人异化的一切主流规约与世俗标准,在

体制外建立了属于自己的理想境界,并为之耗尽了毕生的精力,这就是她和玉家姐妹最大的不同。但是,这终究是个悲剧,“命运才是性格,这个结论是狰狞的,东方式的,它决定了人的从动性。”^[1]筱燕秋结局让人们看到了人类追求理想、寻找自由的艰辛与困苦。她的悲剧隐喻了人与社会、命运等异己势力的永恒对立。从《青衣》到“玉”篇三章,从展现女性的雷雨性格及其所具有的人性深度到女性精神残疾的揭示;从英雄传奇到平民悲剧;从理想主义者对外部世界的抗击到世俗欲望与权力体系的天然湊泊,毕飞宇目光所及,是集权如何具有俘获大众的魔力,并造成淘汰精英的悲剧。这不仅是从生存的本身观照命运,也有其历史性,即从历史文化的传承上挖掘悲剧的根源。

至今,像王连方这种土皇帝式的农村基层干部,仍不鲜见,他集中体现了权力的肮脏残酷与无情,表达了作者最深刻的社会批判。施桂芳、柳粉香、玉米、玉秀的悲剧无一不与王连方有着直接的关系,她们都是滋肥权力这条生物链又被蚕食的低等生物。王连方身为村支书,可以肆无忌惮地蹂躏村中任何有夫之妇,这是明目张胆地借权凌众。如果他偷情的对象不触及权力的中枢神经:军队,王连方是可以任意胡为的。柳粉香“想

收稿日期:2007-05-29

作者简介:罗飞雁(1976-),安徽歙县人,黄山学院文学院讲师,文学硕士,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做奴隶而不得”，她知道逃不了王连方的手掌，所以主动地投怀送抱。看似放浪形骸，其实是有着深深的悲哀。她明白自己婚前不过是娱悦大众的戏子，婚后则是供人生养的“母猪母狗”，然而她既不贞也不能生育，于是自杀成了她唯一的选择。施桂芳是“暂时做稳了的奴隶”，仅凭王连方的好恶就可以随意处置。她在为王连方生下儿子后变得一无用处，身心俱疲，放弃了持家的权利——这一能见证女性价值的最后一个城池。没有了欲望，人之为人的依据在哪里。玉米、玉秀是权力的直接受益者，更是权力的殉葬品，失去权力庇佑的她们，成了任人宰割的刀俎之肉，完成了从主子到奴隶的戏剧性转变。

《玉米》、《玉秀》是宗法社会的缩影，《玉秧》则是集权社会的样板。这所师范学校流行整风肃纪、背靠背揭发、逼供信、阶级斗争。人们疯狂地践踏私人生活领域，拼命地鼓吹禁欲、蔑视肉身、驱逐日常生活，而又不择手段地攫取权力以获得逃脱禁欲生活的机会。在权力角斗的过程中，暴露出人性最阴暗的本质，诸如倾轧、算计、凶残、卑劣等等。这是集权社会为铲除异己而产生的特有的阴谋与暴力文化，它危害了正常的人性，把整整一代涉足其间的人推上道德的审判席。一种未受任何约束的权力可以毫无顾忌地超越法律、道德、良心的底线践踏人性，可以公然侵犯任何私人化的领域。在权力魔杖的庇佑下，任何人都可以借口主义、集体干尽最肮脏的勾当。班主任积极工作的目的是为了捞取政治资本，魏向东更可以培植告密者党羽，满足自己畸形膨胀的权力迷梦和病态肮脏的窥伺欲望。“看与被看”，经由鲁迅，已成为最能毕露国民性的经典文学叙述模式。但鲁迅只注意到了“围观”所揭示出的麻木、酷爱暴力的国民劣根性以及先驱者被人赏玩的苦痛乃至启蒙意义的丧失，却忽视了“窥伺”，这一发生在隐秘处的“看与被看”，这是更能体现文化与人性之畸变的场域。余华近作《兄弟》以及毕飞宇《玉秧》中的“窥伺”，所展现的正是违反人之自然欲求的文化是如何与集权媾合从而导致高压之下病态的人性与政治的奇观：“在全民禁欲的非人性的历史环境中，只有权力阶层才能享有纵欲的豁免权。”^{[21]36}“权力者利用青少年的幼稚，煽动起他们心中骚动反抗的情绪，反过来，青年人利用权力，实现内心对功名的渴望和发现蛰伏于本能的兽性欲望。”^{[21]36}

集权仍是《青衣》的主人公筱燕秋所要面对的强大的异己势力。从文革到改革开放，文化“板结”状态变为“沙化”，诸神退位、信仰缺席。拜物成为新宗教，替代了政治乌托邦的作用，它以维护日常生活的合法性的正义形象出现，成为新时代的主流话语。拜物和革命，虽然内涵不同，但思维方式却惊人的一致，它们的特点是

自塑金身，党同伐异，从而实现对社会的垄断。《奔月》数度搁浅，筱燕秋几起几落的舞台命运，无不反映出集体主义文化下令人窒息的社会氛围。李雪芬和烟厂老板是这种集体主义文化的最绝妙的注脚。李雪芬将嫦娥塑造成女民兵、女战士，就是没有人的光彩与生命，广寒宫里思凡的仙女变成了禁欲的政治英雄，但她的演出总能得到山呼海啸般的欢迎，映衬出筱燕秋不堪的寂寞、时代的颠狂、人性的极度虚伪。李雪芬和她的“嫦娥”成为那个特殊历史时代反自由、反人性、反文化的象征。烟厂老板以交换为目的的施舍，带有新兴暴发户的放肆与不可一世。“伟人”是一个有着丰富政治内涵的概念，书中将烟厂老板称为“伟人”，产生了特殊的反讽效果，金钱与权力再一次联姻，烟厂老板窃取了时代的主流地位，并藉此拥有了对异质人物的生杀大权。

二

玉米从小目睹母亲因未能生儿子而倍受摧残的遭遇，了解到女人生存的全部隐秘。作为乡宦家庭成员，她深知那个年代权力意味着一切游戏规则。因此，她的成长启蒙完全是由权力体系提供的，她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证明自己在这个权力体系中的价值，她与命运搏斗的过程也是不断皈依权力的历险。玉米总将“小八子”喊成“王红兵”，以此区别于普通乡民；羞辱与父亲有染的女性，是为了维护家庭体面；揣着剪刀拉着失贞的玉秀绕村一周，是对没落家庭遭受重创的自尊心极端维护。玉米两次选择与权力结合，第一次是主动媚合，后一次却是无奈逢迎。中间转折的关键是王连方东窗事发，被双开意味着大权沦落，失去权力支撑的一家人前途堪忧。陡经变故，玉米更明白了权力的重要，为重振家声，嫁给了年过半百的革委会主任作填房。小说浓墨重彩地描绘了玉米与彭国梁的恋爱经历。彭国梁是军人，而且是自诩为“与帝修反作斗争”的军人。军人所包含的巨大的政治意义与权力观念足以让玉米无视彭国梁长相上的缺陷，一向要强的玉米自卑了，在权力面前俯首称臣。她对彭国梁的感情显然是被夸大的了，想像的成分多过现实的满足，是一种被狂热的权力情结和虚假的政治热情煽动起来的激情。

玉秀漂亮，天生是一个在戏台上颠倒众生的花旦。青春期的玉秀最大的梦想是成为惑众的美女蛇，要爱情甚至是单纯的情欲怎么说都来得比追逐权力要动人得多、健康得多。玉秀完成了封建观念规定并为社会大众公认的美好女性形象——“贤妻良母”的一次超越。比起母亲干涸贫瘠的精神世界，玉秀不甘现状，不满乡野生活，充满蓬勃的生命欲望。然而她这种确认自我价

值的方式,仍是种依附与媚俗意识,狎邪的光芒掩盖不住主体精神的缺失。以天赋美色获取男性中心社会的被动受宠地位,一旦失贞,被驱逐的命运就不可避免。无法在王家庄立足的玉秀不得已投奔积怨甚深的姐姐玉米,使尽浑身解数取悦郭家父女,利用婚姻搏得立锥之地,希望重回她早就反叛过的女性传统的人生道路:贤妻良母。而事实是,如果玉秀视自己为不洁的人,她将无法立而为人。

玉米,令人震惊;玉秀,使人扼腕;玉秧,则让人怜惜。玉秧和两个姐姐的生活略有不同,考上师范学校完全是个人奋斗的结果。玉秧,这个乡村女孩,是弱势中的弱势,比起姐姐玉米、玉秀,简直就是生活的配角,她没有任何依凭的资本成为人群中的主角。她从不奢望权力,爱情是她心中偶尔闪过的如星光一般的残梦,她最大的梦想是能在人群中奔跑起她胖胖的身体,露出一露她怯生生的脑袋,这卑微的愿望、执着的努力使人无法不动容。一个健全的社会理应保护这种努力,玉秧在校长跑比赛中的落败意味着等待她的将是残酷的生存竞争。在一连串的打击与失意下,玉秧剑走偏锋,投入了阴谋与暴力文化的怀抱,成了一个告密者。

凡是屈从现状的人都走上了悖谬可哀的人生道路:她们充满激情地认同现实秩序,步入权力的魔方,堕入被毁灭的泥淖。无论是玉米对人上人的追求,抑或是玉秀对虚幻爱情的追求,玉秧式的个人奋斗,无不建立在对权力的顶礼膜拜之上。因而不管她们怎样挣扎,终将成为权力播弄的对象。权力对权力皈依者的虐杀充分暴露了两者之间的悖论性关系。玉家姐妹最终都以扭曲的方式活着,玉米在郭家兴面前如同娼妓。玉秀屡次自杀,又都活了下来,支撑她活下去的不是意识到旧道德的扼杀人性,而是极端自轻自贱的想法。玉秧则成了一只嗜爱黑暗的“夜行动物”,生活在窥伺揭发他人隐私的激情中,当“所有卑微的限度都被挣脱”时,玉秧终于在晦暗不明的地平线^{[31]52-153}奔跑了起来。

三

毕飞宇被称为“潮流外”的作家,在这个喧嚣的世界的确是个异数。摒弃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与媚俗和流行握手言欢正成为众多作家们的自觉选择。然而诚如李锐所言:“我们有一种道德感,不是因为我们是一个作家,而是因为我们是一个人。正因为如此,留下内心和情感的真实,留下这个时代良知的证言,就成为文学永不退场的理由。”^[32]毕飞宇所做的正是努力驻足现实,看清人生的真相,挖掘“人间的秘密”,在不义公行的时候表达自己的愤怒,并在文学中构铸超越现实的理想境界。

“戏台上的青衣不是一个又一个的女性角色,甚至不是性别,而是一种抽象意味,一种有意味的形式,一种上上根器。”^[33]“青衣”意蕴深远,象征了不肯遂顺旧俗,具有叛逆精神的人类,体现了拥有丰富心灵世界的人对灰暗世界的阻击与永不妥协。筱燕秋一生都在与权力意志搏斗,无论是青年时期抵制政治意识形态对艺术的渗透,还是中年时期抗击金钱、物欲对艺术的亵渎,对任何时代那些“普适真理”的东西,不管是以“革命”的名义还是以“现代性”的名义,她都抱以怀疑,这使她永远与社会、大众处于焦灼紧张的对抗之中。水泼李雪芬,落了个“妒良才”的骂名,可谁又知道这是对革命话语的极端蔑视,对集体意志强奸艺术的极度愤怒。她拜春来为师,苦熬20年后甘当B角,最后出尔反尔不让春来演A角。匪夷所思的行为中蕴满了对艺术铭心刻骨的爱。筱燕秋是一个偏执的理想主义英雄,说她偏执,是因为她挑战了道德律例,也只有这种超出常规的思想与行为才能撼动集体主义的文化大厦。她从来不渴望在现实的体制中实现个体价值,她的所为只具有精神意义,显示人类所能达到的精神高地。筱燕秋冲动狂热,充满了破坏力与创造力,她执迷不悟甚至不惜自毁以见证人性的强大和不可屈服。她与繁漪、美狄亚属于一个人物谱系,都不是纯洁善良的人——道德意义上的好人,性情乖张,行为出人意料,拥有雷雨般的性格,对顺从、忍让有着本能的反抗。而这正是芸芸众生与悲剧英雄的本质区别:我们在此岸,努力与现实秩序妥协,而他们选择永远站立在世界的对岸,战斗。乔炳璋,是个集体主义文化培养出来的好孩子,在任何时代,都能应付自如,进退有据。春来颇善投机也颇实识务,“嫦娥”对她来说,是真正的名利欲望。玉家姐妹是权力脚下的乞食者。虽然筱燕秋的反抗与怀疑并非源于理性自觉,然而她毕竟在体制外构铸了崭新的价值坐标,这是对权力体系与顺民哲学的双重颠覆。筱燕秋担负的正是悲剧英雄的神圣使命,在本质上,她反映着自由的精神,文学的超越性与永恒意义即在于此。

谄媚或反抗现实,成为这几个文本潜隐着的深层结构,表达了毕飞宇知识分子的立场:呼唤人文主义理想,对充满权力诡计、阴谋骗术、暴力合法性的社会和它塑造的卑劣人格深深地忧虑。突出并张大了在体制外建立个人乌托邦反抗集体主义文化之于人之存在乃至社会、文化的重要性。

四

时代性是作品的重要意义,《青衣》思考人类生存的永恒困境,具有深沉动人的悲剧力量。筱燕秋悲怆的一生就是关于命运的象征性表述:反抗命运的过程就

是投入命运罗网的过程,行动的结果就是飞蛾扑火。个人与世界的对立是任何时代、社会都无法解决的矛盾,自由王国终在彼岸。欲行无为、狼奔豕突,终归幻灭是一切争战者宿命般的悲剧命运。筱燕秋最后完全退回到虚无状态中甚至几近颠狂。“我就是嫦娥”,筱燕秋从始至终都在重复这一句话,这不是当仁不让的自信,甚至不是对艺术的持守,而是人戏合一的生存境界。“嫦娥”于筱燕秋已内化为一种宗教般的理想,一条实现自由的途径,同时也是一个形上的个人乌托邦。乌托邦只能栖身于精神世界,执意地让它飘落现实,以执一以御万的强硬姿态要求人人必得尊奉,就会酿成整个人类的悲剧。就个人而言,在理想与现实的强大冲撞下,人的内心极容易分裂而导致疯狂或弃世。个人乌托邦不具有规范世界与裁决他人的意义,只对自我发言,将利斧砍向自己而非他人,这就是与普适乌托邦的区别。前者不过是集权文化的变种,比如文革时期疯狂的政治乌托邦运动,而后者则具备了维护个体自由保持个体纯粹性的特性。让理想归理想,现实归现实吧,它们之间有着无法弥合的距离。“嫦娥”这一个人的乌托邦不仅隐喻了筱燕秋理想的不能实现,更隐喻了整个人类的生存困境:“长河即落,晓星将沉,嫦娥遥望人间。碧海青天放大了她的寂寞,吃错药是嫦娥的命运,女人的命运,人的命运。人只能如此,命中八尺,难求一丈。”^[4]

毕飞宇在《青衣》缘起中有关命运的那番话,着意强调它的东方色彩,似有意与古希腊悲剧中突出人神关系的特点相区别。就古希腊悲剧来说悲剧的嘲弄意味着天神对剧中人物的一句话或一种愿望的歪曲。^[5]显然毕飞宇的命运观并非是天命、神意、自然的法则这般简单,作品将悲剧的根源转向了人类生存本身,表现了更为现代的人生观与哲学观,突出了自由与限制之间的关系,强调了乌托邦理想不能实现又不能摒弃的悲剧冲突。但其中仍带有中国人思考世界、人生的基本特色,揭示的是人性、生存、社会的特殊结构,而不是人性、生存、社会的普通结构,呈现了具体环境中的人,并

从具体中寻找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毕飞宇将他的命运观称为东方式的,不仅因其具有决定人的从动性的东方神秘主义色彩的外壳,更因为无处不在的“命运”指向了集权文化对中国长久的统治。自诩最进步的人类往往创造最无理性的历史与非人道的文化,它们反过来戕害人类的自由与尊严,以最反人性的方式实践最有人性的理想,这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悲剧,也是中国现代历史所留给人们的最尖锐的拷问。

权力体系中的种种倾轧、暴力、阴谋等现象无不有赖于社会对个体欲望、个性价值的尊重,人类需要树立这样的基本认识:放弃乌托邦的普适意义恢复其个人性,承认乌托邦的精神意义放弃其现实可能性。《青衣》的抗争与抗争无望是一个悖论,正如前所说,这是与人存在相联系的悲剧,是地久天长的悲剧。但人类不能因此放弃对理想的追寻,无所为就会成为黑暗的帮凶,就会成为旧秩序的共谋者。困兽犹斗式的抗争,体现的正是个体强悍的生命意志与无穷追求的人性伟力。支撑着黑暗闸门的正是这些明知绝望而仍反抗的人们。“悲剧英雄总处于命运之轮的顶端,处于地面上的人们与天空中更为高贵的事物之间。”生如夏花之灿烂,生命如能在毁灭前就充分地爆裂,那么就不是生命的失败而是胜利。

参考文献:

- [1]毕飞宇.青衣问答[J].小说月报,2000,(7).
- [2]陈思和.新文学传统与当代立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
- [3]李锐访谈录——写作在物质时代的命运[N].南方周末,2002-08-15.
- [4]毕飞宇.青衣[J].花城,2002,(3).
- [5](英)阿尼柯尔.西欧戏剧理论[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5.

责任编辑:曲晓红

Besiege and Breakout ——Comments on Bi Feiyu's "Yu Series" and Grey Cloth

Luo Feiyan

(School of Literature, Huangshan University, Huangshan245041, China)

Abstract: Bi feiyu's Yu series and Grey Cloth is the critic text of collectivism culture. The former expresses the author's anxiety of humor dissimilation under the centralization; the latter dramatizes the humanity power in the revolt against centralization. Fawn on or revolt the reality is the base of comparing these novels, which express the intellectual critic position of the author, and the significant meaning of building up individual Utopia ideal.

Key words: Yu series; Grey Cloth; humanity dissimilation; individual Utopia ideals